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延安时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实践研究

——根据地农民教育为中心

秦燕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延安时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实践研究

——以根据地农民教育为中心

秦燕◎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研究：以根据地农民教育为中心 / 秦燕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 - 7 - 5203 - 3609 - 3

I. ①延… II. ①秦… III. 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国—
1935—1948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584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鹏

责任校对 刘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15 千字

定 价 9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西北工业大学专著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目 录

绪 论	(1)
一 从实践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1)
二 延安时期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4)
三 通过农民教育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7)
四 本书的研究思路及资料	(13)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3)
一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语境	(23)
1. 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与“大众”的崛起	(23)
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9)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初步建构	(31)
1. 劳工大众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	(31)
2. 必须以农民群体为主要对象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35)
3. 农民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载体	(43)
三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完善	(53)
1. 明确了大众化的对象和实质	(54)
2. 理清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个重要关系	(56)
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	(61)
第二章 大众化实践之一：抗战爱国的民族意识教育	(64)
一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	(65)
1.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源流	(65)
2. 中国反侵略斗争与民族国家建立的同步性	(67)

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战争的理论与主张	(69)
1. 对传统民族主义和近代民族主义的超越	(69)
2.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战争的观点	(75)
三 农民与乡村民族主义	(81)
1. 农民是否有自发的民族主义	(81)
2. 农民最初对待抗日的态度	(85)
四 抗战教育的全面实施	(88)
1. 通过文化教育提高农民的民族意识	(88)
2. 寓教于乐的抗战教育	(95)
3. 抗战教育与改善农民生活相结合	(101)
五 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农民爱国主义高涨	(106)
1. 以民族国家取代宗族	(106)
2. 学习做模范公民	(111)
3. 农民积极支持抗战	(114)
 第三章 大众化实践之二：阶级斗争教育与乡村社会变迁	(120)
一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120)
1.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120)
2.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及宣传	(124)
二 中国传统乡村的现实状况	(136)
1. 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及分层观念	(137)
2. 农民的反抗和阶级斗争的基础	(142)
三 阶级斗争教育的深入与土地改革运动	(146)
1. 阶级意识的灌输	(147)
2. 组织阶级队伍	(153)
3. 实际斗争中的阶级教育	(160)
四 阶级斗争理论大众化的成效	(165)
1. 阶级斗争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	(166)
2. 阶级斗争促进了农民意识的变化	(171)
3. 阶级斗争的过程重塑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175)

第四章 大众化实践之三：民主政治教育与日常生活	(179)
一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发展	(179)
1.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中国化	(179)
2. 民主与大众化	(187)
二 对农民的民主政治教育	(189)
1. 选举运动：农民大众参与政治	(189)
2. 对乡村基层干部的民主教育	(199)
3. 训练民众参政议政的实际能力	(207)
三 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参与	(211)
1. 实现有事多商量的基层民主	(211)
2.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213)
3. 社区生活中的民主参与	(217)
四 创造本土化的大众民主	(221)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艰辛探索：个案研究	(226)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独特创举	
——对农民传统组织的“政治化”	(226)
1. 农民民间组织的传统模式	(226)
2. 对哥老会的“政治化”	(230)
二 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的调适：婚姻制度改革	(234)
1. 颁布新婚姻法	(234)
2. 与农民传统习俗的矛盾	(237)
3. 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政策	(241)
三 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应大众的需求：新文字运动的兴衰	(247)
1. 文字改革与阶级解放	(248)
2. 新文字运动的蓬勃开展	(250)
3. 遭遇尴尬：民众的冷漠	(252)
4. 认识文化教育的本土化、民族化特性	(255)
四 农民教育的新变化：从苏维埃时期到延安时期	(257)
1. 苏维埃时期的农民教育	(258)

4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研究	
2. 延安时期的变化	(263)
第六章 延安时期农民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征分析	(269)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鲜明的实践特征	(269)
1.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269)
2. 在农民教育的实践中创造革命主体	(277)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在农民教育的过程中相互促进	(284)
1. 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教育和动员农民大众	(285)
2. 大众化影响和促进中国化	(289)
三 农民教育的过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的双向互动	(291)
1. 现代革命与农民传统的纠结和互动	(291)
2. 对农民传统文化的提升、重新解读和合理借用	(296)
四 在实践中形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多种途径	(301)
1. 农民的组织化是大众化的坚实载体	(301)
2. 采取农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	(306)
3. 切实改善农民的生活	(310)
五 农民教育实践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	(314)
1.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重要的创新	(314)
2. 初步形成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机制	(320)
第七章 结语	(323)
主要参考文献	(330)
后记	(342)

绪 论

最近若干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内容、实现途径、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按照目前学术界通行的定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是用马克思主义“化大众”。把马克思主义由外部灌输的理论内化为人民大众的信仰和追求。马克思主义只有被人民大众掌握并运用到实践中改造世界，才能实现其价值。所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实现大众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终极目标。大众化的结果就是大众接受和认可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内化为自身的信仰，成为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不断转化。^①由此可见，大众化的目标以及目标实现的过程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紧密结合、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性特质。

一 从实践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人类思维中的普遍规律。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实践的理论，实践品格是马

^① 余君、高正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若干问题辨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研究

克思主义最为重要和根本的品格，其具有多重而又相互关联的内涵：其一，高度重视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① 毛泽东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② 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实现自身、检验自身和发展自身的。其二，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不仅是要能够科学地解释世界，还要能够合理和有效地改造世界。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 实际地改变事物和世界的现状，推动现存世界向更合理、更理想的社会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的初衷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也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鲜明的革命实践品格。其三，人民大众是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主体，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就必须通过实践动员群众和掌握群众，将一种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精神力量转变为现实的积极的物质力量。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④ 在人民大众的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价值取向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缺乏实践性的思想不可能有大众化的冲动和力量，而离开了大众化，实践性就失去了最为坚实的民众基础和主体力量。”^⑤ 因此，从实践角度开展马克思

① [德]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②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③ [德]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④ [德]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⑤ 欧阳康：《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与大众化取向》，《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主义大众化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已发表了许多成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仔细分析，相当一部分表现出如下倾向：一是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理论层面的探讨，而相对忽视对大众化产生和发展的实践环境和实践内容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始终是在具体的历史、场域、情境中逐渐展开的，不同阶段的大众化有其不同的内容和特色，需要具体的研究和说明，如果没有对实践状况的仔细了解和充分把握，一般性地讨论大众化理论，可能是空泛的和没有意义的。二是现有研究的立足点和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政党意志、革命意识形态在政治、理论层面的需求，有意无意地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作一个革命政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单方面的自上而下的贯彻实现过程。以上两种研究倾向都抽离了大众化所产生的历史语境，特别是忽视了对大众化的对象——广大民众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极易导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悬置和虚化，从而蜕变成失去生命力的空洞的理论和愿景。三是现有研究缺少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对话和交融，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了一个封闭的话语体系，造成了讨论议题的单调和重复。近年来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关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虽然在表述上没有使用“中国化”“大众化”的概念，但相关研究对中国农村社会、农民革命、农民日常生活状态、农民意识变迁的深入探讨，揭示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许多重要的面向和规律，这些内容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很多方面高度重合。事实上，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同处一个“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讨的重大课题，它有助于从实践层面更具体、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主要内容及其特征，有助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研究的新视野，从而获得许多新的启发。

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不仅如上所言，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实践性品格所决定的，还因为中国革命本身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质上是一个实践过程。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实践主体是人民大众，而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人民大众最主要组成部分的农民，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文盲，系统的书本知识、纯粹的理论显然与他们是隔膜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写《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明确指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作生产斗争知识，另一门叫作阶级斗争知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实践主体都是农民大众，面向农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生活实践体现出来。不了解农民、农村的现实状况，不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的实践和农民日常生活的实践，企图真实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更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大众化的理论并不是现成的，一开始不可能有一个现成的理论指导大众化实践，只能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只有通过对实践的观察、了解和研究，洞察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在实践过程中的关系和互动，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特点诸问题有真实地理解和把握。

毋宁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过程是一种“实践历史”，实践在这里表述的是三个不同层次而又相互联系的含义：“相对理论而言的实践、相对表达而言的实践以及相对制度结构而言的实践（或实际运作）。”^① ‘实践历史’不仅包含这三种实践的历史，也包含它们经过与理论、表达和制度之间的互动而体现于实践的历史。”^①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过程所呈现出的正是这种历史与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应该说，理解、洞察和揭示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不断深入的不竭动力。

二 延安时期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由最初的知识分子书斋式的研究应用到中国革命的现实，就开始了其中国化、大众化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

^① 黄宗智：《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和社会改造的具体实践，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延安时期无疑占据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到达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直罗镇，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时开始一直到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的“延安时期”。^①这一时期有几个重要变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密切相联系。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即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农民大众因此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主要的实践主体。

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是与农民、农民革命紧密联系的。江西苏维埃时期虽然建立了革命政权，但毕竟只局限于南方的小部分农村，延安时期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大规模的实施，形成以延安为中心同时并存的十几个革命根据地。^②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及建设，由苏维埃模式转变为摆脱苏俄影响而走上中国化的“延安道路”，“它是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出现的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风格及它的综合制度，”^③

① 目前学术界关于“延安时期”的时间界定有三种观点：其一，从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至1948年解放军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其二，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东去西柏坡；其三，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至1947年3月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本书所指“延安时期”基本遵循第一种观点。1935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预示着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开始，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至1948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领导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离开陕甘宁边区，这期间，建立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央根据地并包括其他十几个根据地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政权体系，在持续的战争环境里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因此，本书所指“延安时期”，不仅指时间概念也兼及空间概念，所论述的内容从1935年至1948年，在地域上以陕甘宁边区为主，还兼及同一时期的晋绥、晋察冀、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

② 在陕甘宁边区的示范和带动下，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江、苏南、苏中、苏北等根据地很快就建立起边区或相当省、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制订了施政纲领，建立了大体相近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实施相同的文化政策，因此所有根据地具有某种统一性，构成一种“根据地体系”模式，延安则成为政治中心和指挥中心。

③ [美]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6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研究

体现了中国革命对人民战争、革命和农村社会改造做出的最突出、最富有特色的贡献。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广大农村根据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主要的社会实践场域，农民大众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主要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乡村革命和改造的具体实践，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基础，并最终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第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据统计，《毛泽东选集》1—4卷收入毛泽东著作159篇，其中在延安时期撰写的112篇，占到70%。《毛泽东文集》1—5卷收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504篇，其中在延安时期撰写的385篇，占到76%。^①毛泽东的重要著作《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完成的。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实践，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上了它深深的印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成果，其基本理论几乎都是围绕着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形成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是领导农民革命的问题；武装斗争的实质是农民战争；建党的问题是努力消除农民意识的消极影响，建设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革命军队建设即要将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化的新型军队；极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要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教育和改造农民；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最终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归根到底，如何使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和运用于农村中国的革命实践，如何得到农民大众的认同和支持，使农民发挥“革命主力军”的作用，始终是中国民主革命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农民、农村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形

^① 谭虎娃：《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成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语境，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向农民大众宣传灌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第三，延安时期全民族的抗战热潮以及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后方政权，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农民大众，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和广阔的社会实验场。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大众，实施了以政治教育为主，涉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面的农民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广大农村的传播，有效地组织动员农民，从而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改造乡村乃至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过程。没有对农民的教育和动员，没有占中国人口大多数农民的参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延安时期是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典范，在延安农民教育实践过程中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民主选举运动”“劳动英雄运动”“识字扫盲运动”等各种群众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动员底层民众参与的有效手段和途径，不仅收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显著效果，而且由此形成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对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三 通过农民教育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首先是一个大众化的过程，即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并得到认同、接纳后逐步向工农大众传播。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建构起有关中国革命的一套理论和观念，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核心的内容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封

建主义压迫”“阶级斗争”“革命”“人民群众”“民主”“平等”等。显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现代性革命在指导思想、观念和目标方面都与中国旧式的农民革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国内外的研究者都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基础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工业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并不具备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因此，中国共产党推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实质上就是一场先进的革命思想在古朴的乡土社会的广泛动员，不能不面对一种现代革命与农民传统纠结的局面。以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一方面是理论上的理想“大众”，即作为“革命主力军”，具有革命反抗精神，能够担当社会变革、成为建设新的民族国家理想主体的“大众”；另一方面则是在现实中切切实实存在的农民大众，绝大部分为文盲，与现实政治隔膜，有着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理想，束缚在家族、宗教等等地方关系之中的眼光狭隘的小农。当面对真正的农民大众时，不难发现，现实中的农民大众与旧式造反的农民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农民大众有着自身特有的习性和文化传统。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现代性梦想如何实现？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争取劳苦大众解放的理论落实到农民大众身上？如何顺利地实现政治功利目的制约下的社会现代性追求与农民大众固有的传统、话语形式的合理融合，就成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面对和解决的中心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即是必须对农民进行全面的教育和动员。中国革命不同于马克思所讲的西方社会无产阶级革命，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将小生产者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同时又需要对农民进行引导和改造，“由于政治变革指向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梦想，现实中的‘大众’本身也是被规训和改造的对象，只有按照政治意识形态和理想建构出的‘大众’，才能满足其作为主体的条件。”^①这中间的转换环节就是大规模的教育和动员，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教育和引导农民，亦即毛泽东所说，必须将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在先

^① 罗立桂：《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大众文艺》2011年第14期。

进政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农民将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中国共产党为此进行了艰苦而漫长的实践探索。

本书所论说的“农民教育”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它并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育或文化教育，而是包括政治教育和动员、意识形态灌输、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教育和改造等非常丰富的内容。确切地说，延安时期的农民教育，不是单纯由专业教育组织进行的以传授文化知识和技能为目的的教育活动，而是由革命政党、革命政权所进行的以彻底改造原有社会为目标，以培养教育对象增强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为表现形式，并由此引起社会结构、生活样式发生变革的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传统社会，教育往往是通过宗教机构、家族或专业组织进行的，而在现代社会，教育则是国家社会的公共事业，现代教育对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至关重要，它将一种所谓民族的“高级文化”灌输给大众，使得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的沟通整合成为可能。普及教育使得一般民众建立起对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对都市的官方文化变得熟悉，有利于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现代教育对于形成“想象的社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和认识功不可没。^①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农民进行的教育，并不是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但也同样起到了类似的显著效果。

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的民主革命时，使用的是“政治动员”的概念和分析视角。“政治动员是指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政治集团等，为聚集力量，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等行为。”^② 政治动员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其解说模式主要关注动员者的政策、动员技巧、动员类型、动员效果，而较少从被动员者的角度看问题。动员者往往处于领导的地位，具有决策能力和组织能力，有着为实现目标而奋斗的决心和勇气。政治动员理论往往忽视了农民在革命中的能动性，容易把农民当

^① 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 1897—1937》。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2 页。

^② 林伟京：《建国前毛泽东政治动员思想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 年第 1 期。